

学苑漫笔

评论视点

文化空间

书评序跋

学术探索

随感图吧

美术画页

评论视点

东亚一体化的进程与特点

文/李丹

作者简介:李丹,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政治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欧洲一体化取得了巨大成就,是世界上目前一体化程度最高的超国家集团。一体化塑造了欧盟,欧盟成就了一体化的最高形态。至今还没有任何一个地区的一体化可与欧洲一体化相比肩。亚洲一体化可否从中得到一些借鉴?

一、一体化的含义

关于一体化的含义,并没有一个清晰统一的认识。何为一体?是整体(相对于个体)?是统一(相对于差异)?是超国家(相对于主权国家)?是区域化(相对于全球化)?是制度化为新的行为体(相对于旧的政治单元)?

(一)一体化是从部分到整体的过程

一体化是各个组成部分逐渐形成一个统一整体的过程。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多伊奇认为,“实行一体化通常意味着由部分组成整体,即将原来相互分离的单位转变成为一个紧密系统的复合体。……因此,一体化就是单位之间的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它们相互依存并共同产生出它们单独时所不具备的系统性能。”^①从部分到整体的过程是一个既竞争又合作的优化过程,一体化能够产生出“1+1大于2”的效能,这正是其价值所在。欧洲著名的一体化研究中心之一曼海姆大学的拉哈博士认为,“作为一种社会—政治现象,一体化就是一个相互作用、彼此联系的过程,该过程使各部分通过不断的彼此敞开和互相接纳(多样性原则)而形成一个‘整体’;而且,相互间的联系程度如此之紧密,以至于出于这样一个共同体的整体利益需求(同一性原则),它们之间的‘不同’渐渐被它们自己和外部世界抹去了。”^②整体性意味着成员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对内有归属感,彼此之间有认同感,对外被看作是一个整体。

(二)一体化是从差别到统一的过程

不少人认为统一的、同质的东西才是一体,一体化是指多个原来相互独立的实体通过某种方式逐步结合成为一个单一实体的过程。“一体化既是一个由差别到统一、由分离到联合的过程,又是一种统一的、联合的状态。”^③由于成员国在一体化过程中相同点日益增多,彼此之间客观上越来越相似、相近、相融、相同的同时,增强了意愿上的相互磨合,彼此靠近,协调趋同,纳入

一体。“统一”比“整合”要高出一个层次,疑欧派人士、捷克总统克劳斯认为,“‘整合’是在一个水平面上的,而‘统一’却是垂直的,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④一体化到一定程度就必然体现为同质化,同质化到一定程度则可视作统一。

(三)一体化是由国家向超国家过渡的过程

一体化是指各个独立的主权行为体通过某种方式形成一个新的超国家行为体的过程,这一过程通常要伴随民族国家主权不断让渡和汇集,这是一体化从经济层面跃升到政治层面的标志。主权让渡有多种形式:妥协、约束、限制、分割、让与,其标志是使公共权力突破国家界限在跨国层面上运行,其限度是主权让渡后得到的利益要大于或不小于主权独享时的利益,这也是主权让渡的动机与动力。从长远看,主权共享是全球化时代行使主权的新形式,一些专家甚至认为固守主权是反动的,狭隘的民族利益与全球化倡导的人类共同利益不相融,是导致矛盾与冲突的根源。主权让渡到共同体有利于约束传统主权框架下国家的利己天性。

(四)一体化是地理相邻国家实现区域化的过程

迄今为止,一体化都发生在地理位置相邻近的国家或地区之间。在全球一体化遥不可及的情况下,区域化是某一地区国家集体应对全球风险的现实选择,因此目前一体化往往具有地区性特征,学者们常常称一体化为“地区一体化”,或“区域化”。因此有学者总结道,一体化是指某一区域或全球范围内所有成员在一定区域内聚合为新的行为体的过程,趋势或状态和结果。^⑤目前世界上区域一体化集团已经超过100多个。海湾合作委员会、安第斯共同体、南美共同市场、里约集团、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西非经济共同体、东非共同体、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非洲联盟等都显示出了很强的生命力,成为促进域内繁荣、应对外部竞争的有力手段。欧盟、东南亚国家联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分别主导了欧洲、东亚和北美的一体化进程。

(五)一体化是通过制定法律实现制度化机制化过程

一体化是志同道合的国家持续合作、制度化合作不断发生的过程。联邦主义者认为,一体化的终点是建立联邦国家,联邦国家形成的标志是,有一个经选举产生的中央政府,有单一货币和共同防务力量,有一部成文宪法,有一个可进行仲裁的法院。^⑥可见,一体化要求机制化、制度化,这既意味着要有决策机构、执行机关、保障机器,也同时意味着制度整合、法律协调、法制统一。历史制度主义强调,一套既定的制度一旦建立后,影响或限制着建立制度者的行为方式。过去的制度选择能够持续下去,或者能够锁定后面的选择,因而塑造并限制了后来的行为体,给后来的改革设置了很高的门槛。制度或多或少具有的“粘性”或路径依赖是合作的有效保障。制度安排强化了机构的作用,机构又进一步推动制度化的深化、持续化。

二、东亚一体化的进展

1967年8月8日,东南亚五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五国成立的“东南亚国家联盟”(The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

tions),简称东盟(ASEAN)。1984年1月7日,文莱加入;1995年7月28日,越南正式加入;老挝和缅甸同时在1997年7月加入;柬埔寨也于1999年加入。于是,东盟在上世纪末形成了包含东南亚10国,总面积达450多万平方千米,总人口达5亿多人的大东盟。

东盟在成立后的10年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是由于内部各国经济互补性差,对外开放程度不足,使得国内生产总值和对外贸易额在国际上也相当有限。1990年12月16号,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提出了要联合中、日、韩一起建设“东亚经济集团”的设想。主旨是联合东亚所有国家,抵制发达国家的歧视性贸易规则,同时为东亚地区的贸易与投资活动注入新的活力。中、日、韩也想通过和东盟的合作一方面实现经济上的共赢,一方面提高自己的国际政治地位。1991年3月,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召开的东盟经济前景研讨会上,马哈蒂尔重新提出建立东亚经济集团的建议。但是这个建议提倡的参与主体是东亚所有国家,把美国排除在外,因此遭到了美国的坚决反对。紧随美国政策的日本随之表现得很犹豫,东亚各国的热情也不是很高,因此“马哈蒂尔只能将他所主张的紧密机制化合作的经济集团降格为比较松散的东亚经济论坛”。^⑦东亚经济集团和东亚经济论坛虽然都未付诸实施,但是为东亚区域发展积聚了力量。1995年东盟首脑会议在泰国举行,会上东盟正式提出与中、日、韩三国首脑举行会晤的建议。此次建议东盟是出于“平衡外交”的考虑,所以坚持同中、日、韩3国同时会晤。但是,日本想和东盟单边会晤,因此此次建议并未得到日本的响应。

直到1997年底的亚洲金融危机,美国保持隔岸观火的姿态,世界货币基金组织提出了援助的苛刻条件,才使得东亚各国深刻认识到只有东亚各国真正走向合作才能解决危机。1997年12月5日,“9+3”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举行(柬埔寨于1999年才加入东盟)。这是历史上东亚国家领导人的首次聚会,东亚合作进入了实质性启动阶段。1998年12月16日,东盟与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在越南河内举行,会议对进一步稳定地区经济和金融形势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第三次会议于1999年11月28日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因柬埔寨于当年加入东盟,东盟成员国扩大为10国,会议名称变为东盟与中日韩“10+3”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会议发表了《东亚合作联合声明》,确定了东亚合作的方向和重点领域:经济、金融和科技领域。第四次会议于2000年11月24日在新加坡举行,从此次会议起,会议名称不再称非正式,而改为东盟与中日韩“10+3”领导人会议。会上,时任韩国总统的金大中首次提出建立“东亚经济共同体”的主张。也是在他倡议下成立的“东亚展望小组”于2001年最早提出,“东亚共同体”应该作为东亚合作的长远目标。

新世纪以来,东盟与中日韩“10+3”合作大发展的同时,“10+6”模式也迅速开展起来。2002年第六次“10+3”领导人会议通过《东亚研究小组最终报告》,报告提出的九项中长期措施之一是“推动‘10+3’领导人会议向东亚峰会演变”。在东盟推动下,首届东亚峰会于2005年12月14日紧随东盟与中日韩“10+3”峰会其后举行,“10+3”加上澳大利亚、印度、新西兰三国建立的东亚峰会即“10+6”由此启动。2010年7月20日,第43届东盟外长会议在越南首都河内

闭幕。会议发表的联合公报称,欢迎俄罗斯和美国成为东亚峰会的成员。2010年10月第五届东亚峰会上俄罗斯和美国加入,形成了“10+3+3+2”的“10+8”合作机制框架。至此,东亚框架合作呈现多层次化。

鉴于此,可以把亚洲合作分为五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10”,即东盟自身的发展与合作,处于领先的地位;第二个层次是“10+1”,即东盟分别与中、日、韩之间的对话与合作;第三个层次是“10+3”即整个东亚范围的对话和合作,在东亚合作中起主导作用;第四个层次是“3”,即中、日、韩之间的对话与合作,是关键性因素;第五个层次是13国与印度之间的合作。印度前总理瓦杰帕伊最早提出“亚洲经济共同体”构想。现任总理辛格又将这一构想进一步细化,并正式向东亚国家提出。所谓“亚洲经济共同体”,就是把现有的东亚“10+3”机制,加上印度,变为“10+4”。这14国目前的人口超过30亿,占世界人口一半,贸易规模已超过北美自由贸易区,外汇储备更是超过北美自由贸易区与欧盟的总和,所以在综合实力上可与欧盟及北美自由贸易区相提并论。如果说前四层是核心的东亚一体化,加上印度后扩展为亚洲一体化,那么算上“10+6”的澳大利亚、新西兰及“10+8”的美国、俄罗斯,就突破了亚洲一体化的范畴,成为亚太合作了。但它又与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不同,后者范围更广,机制更松散。

从东亚一体化之始到现在,政治、经济、安全、文化各领域的合作得到了很快的发展。在政治上,各国领导人在促进经济合作发展、促进地区和平稳定的合作目的上达成了一致,并确立了建立东亚共同体的共同目标。在决策体制上,从松散的协商一致的合作原则向机制化建设的决策上开始探讨。机构上已经建立了正式的首脑会议、并积极开展部长级会议、特定领域的高官会议,共同对13国关心的公共问题进行商讨;在经济上,多边或双边伙伴关系发展如火如荼,并努力发展双边或多边自由贸易区。在东盟内部,从降低关税开始朝向贸易自由化发展。原东盟6国于2010年1月1日起免除所有产品关税,实现完全自由化,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等4国也将提前于2015年达到完全贸易自由化的目标,允许部分敏感商品仍按原计划于2018年实现零关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已经在2010年第一天正式启动。中国与东盟主要6国相互取消约7000种商品的关税,占比90%,其余4国将在2015年以前取消关税,涉及领域包括服务业和农业等敏感部门。整个新建自由贸易区的国内生产总值将达6万亿美元,贸易总额达4.5万亿美元,覆盖人口19亿,是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世界最大自由贸易区,经济规模仅次于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同一天,韩国与东盟主要6国也将基于2007年生效的自由贸易协定,相互取消约80%贸易品的关税。而且,印度与东盟的自由贸易协定、印度与韩国的经济合作协定也同时生效。由于日本与东盟的经济合作协定已经生效,一个以东盟为核心的拥有32亿人口的巨大市场正在形成。亚洲正在朝着区域一体化的方向高歌猛进。金融合作方面,清迈倡议多边化协议于2010年3月生效,总额达12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库也随之建立。随着亚洲区域内贸易流的增强,人们正在展望从外汇储备库到亚洲货币基金、亚洲货币联盟再到发行“亚元”的美好前景。

2012年11月,由东盟倡议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正式启动。这一组织主要成员国包括东盟10国,以及与东盟已经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即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印度。东盟10国与这6个国家分别签署了5份自由贸易协定,其中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共同与东盟签署一份自贸协定。按照计划,“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2013年初启动谈判,2015年底完成谈判并进入实施阶段。建成后,这个全新的自由贸易组织拥有世界约一半的人口,年生产总值占全球的1/3。RCEP的目标是消除内部贸易壁垒、创造和完善自由的投资环境、扩大服务贸易,还将涉及知识产权保护、竞争政策等多领域,自由化程度将高于目前东盟与这6个国家已经达成的自贸协议。

三、东亚一体化进程的特点

按照一体化的经济理论,区域化应该是循序渐进的,从优惠贸易安排、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再到共同市场、统一货币区,最后再到政治联盟。几十年来欧盟就是这样走过来的。与其相比,亚洲一体化目前呈现出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它走到了哪个阶段?

1.在经济整合方面,亚洲一体化还处于经济共同体的早期阶段。亚洲一体化基本上是穷国一体化,不像欧洲一体化是富国一体化;而且亚洲各国内部差异大,虽然早于北美自由贸易区,但东盟10国之间的差异远远大于美加墨之间的差异。这决定了亚洲一体化的长期性、缓慢性。东亚大多数国家是后发国家,普遍面临着沉重的现代化任务——经济发展、政治改革、思想观念更新,它们需要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内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发展道路,急剧的社会变革往往造成社会问题的集中爆发,严重的甚至引起国内政局动荡。同时,这些国家在国际社会又大多处于弱小地位,这就使国内的脆弱性愈为严重。“国内社会的脆弱和国际社会地位的弱小要求国家掌握更多的主权,尽量减少国际自由市场对国内社会的冲击,有力地解决国内出现的现代化问题,控制国内政局。如果我们考虑到亚洲国家的现代化途径——在强有力政府的主导下不断推动对外开放和国内机制改革,而现代化过程中的不协调又造成这些国家的内部脆弱,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在国际经济的互动中东亚国家始终强调国家主权,不愿为地区机制所制肘。”^⑧这注定了亚洲一体化进程的艰难和漫长。虽然亚洲联合出现了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海湾合作委员会、南亚区域合作联盟、中亚经济共同体等形式,但目前显然以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为核心,实质是东亚一体化,而真正的经济一体化进程直到90年代初才开始。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东盟自由贸易区才逐渐成为亚洲一个次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新世纪后,“10+1”(中、日、韩)、“10+3”(东亚FTA)、“10+6”(亚太FTA)建设如火如荼,取得了显著进展。但整体上看东亚一体化水平还停留在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早期阶段,连自由贸易区还尚未完善。

2.在机制建设上,亚洲一体化至今还是缺乏约束力的松散联盟。制度建设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占有核心地位。东亚一体化虽然逐步建立了较完整的合作体制,包括首脑会议、部长级会议、高官会议、工作层会议。但是由于这些软机制在成立之初便立足于对成员国采取不干涉原则,从而造成了东盟特有

的松散的合作机制。这种松散的合作机制虽然尊重了成员国自主处理内部事务的权力,促进了亚洲国家的和平共处,但也使东亚一体化在实质性问题上经常难有作为。相比于处于“后现代国家”阶段的欧洲国家,亚洲国家大多还处于“前现代国家”时期,似乎更热衷于捍卫主权的完整性和不容干涉性。因此在处理合作中遇到的利益博弈时,总是显得力不从心,协调与合作常常以会议的形式召开,没有实质性的行动,因此亚洲一体化的成果较少。相比于拥有成熟法制体系,称得上是民主摇篮、法制先驱、议会之母的欧洲国家,“亚洲大部分国家缺乏完善、强有力的法律制度和治理方式,这主要体现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上。虽然这些国家依照宪法缔造,但在一定程度上却由传统的社会观念而不是法律规范主导着国家与社会的关系。”^⑨个体国家的法制建设状况决定了亚洲一体化机制在规范化、法制化方面的缺失。

3.在权力结构上,亚洲一体化则以小国为核心,动力明显不足。亚洲最大两个国家中国与日本长期在外交上龃龉不断,无法形成合力,充当引领一体化进程的发动机和火车头,这是亚洲一体化进程之所以远远落后的原因之一。东盟小牛拉大车,缺少强大的动力源。“这种东盟为驱动力的地区一体化,一方面难以调动大国参与地区一体化建设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也难以构建有效的地区安全秩序,而且东盟为弥补领导能力的不足对大国施展的平衡外交作用有限。因此,东亚一体化要求中日两国的和解,共同作为东亚一体化的发动机,必要时可以吸收韩国作为中日两国的缓冲剂和润滑剂。没有中日两国的和解,就没有东亚一体化的强大动力,就不可能有东亚一体化深入持续发展。”^⑩但中日之间的新仇旧恨又不是短时间就可以解决的,最少还得经历一两代人的努力。另外日本虽然作为经济大国,但是缺乏内部市场,经济连续停滞二十年后活力消耗殆尽。有人认为,中国在东亚大市场上成长中的战略地位是不可动摇的,因而必然会产生主导效应。^⑪但中国经济、技术、管理能力有限,短期内还不能、也不宜起主导作用。东盟为了提升自己在合作中的领导地位,转向接受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3国加入东亚自由贸易区,同时引入俄罗斯和美国,建立亚太共同体。这给亚洲一体化带来了变数。

4.在文化基础上,亚洲国家彼此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亚洲一体化是异质文明的组合,亚洲国家在宗教文化、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外交政策上异质性强。虽然东亚地区一方面由于历史、地缘的相关性,长期以来同受儒家文化的影响,有着某种共同的文化背景,但儒教文明并没有在亚洲获得绝对一统天下的地位,而是与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三分天下;另一方面,东亚各国近代以来受到西方文明的强烈冲击,受到不同殖民者、占领者的影响,儒家文化没有获得进一步整合,统一的亚洲意识还未形成;日本的野蛮侵略和“脱亚入欧”外交取向严重分化了本地区的区域意识,导致亚洲认同的分裂和破碎;同时亚洲国家有领土领海之争,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不同,相互防范心理较重,加上信仰繁多,教派林立,民族纷争不断。这些都影响了亚洲的集体认同。根据集体认同来源的差异,大概可以把认同分为三种基本类型。第一,归属感认同。是国家的地区属性和身份的象征,是由于长期交往而形成的本地区内历史、文化和各种亲缘关系。第二,回应性认同。即地区内国家在与区外国家的

互动过程中,认识到自己与外界差异性,对自我地区身份的认同。第三,功能性认同。在由相互依赖产生回应性认同的利益共同体基础上形成的集体认同。^⑫对于亚洲国家,归属感认同有一定基础,回应性认同不断受到冲击和干扰,功能性认同有待在一体化中加强。

5.在国际环境上,亚洲一体化受到美国的干扰和牵制。地区一体化的建设不仅是地区内国家的互动过程,还要受地区外政治势力尤其是大国、霸权国的影响。美国从其国家利益出发,希望能保持自己在东亚的霸权地位,因此对亚洲一体化持反对意见。为了阻止日本、中国和东盟区域合作的发展威胁自己的地位,美国千方百计的阻挠“10+3”进程。马哈蒂尔提出的“东亚经济会议”和日本提出的亚洲货币合作都因美国的反对而夭折。近来,美国主导下的亚太经合组织范围更广、规模更大,大有冲淡或是取代东盟主导的“10+3”合作框架之势。2011年11月美国正式推出《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框架协议,旨在拉拢日本和中国周边国家,维持和强化美日及亚太军事外交同盟,不乏有拆散东亚现有合作架构、重构亚太和全球贸易版图的意图。无论如何,东亚一体化才是亚洲一体化的核心。如果说美国力量注定在所难免、不可排除的话,那么它也应该在亚洲国家领导的机制内发挥影响,建立“欧洲人的欧洲”是法国致力于欧洲一体化的重要动力,那么最起码也要保证日本参与东亚领导机制代表的不是美国意图。这是中国参与主导东亚一体化的必要性和难度所在,东亚离不开中国引擎,但美国不愿意由中国来主导东亚一体化进程。这是东亚一体化发展的一个症结,中、日、美既合作又冲突的三国演义及其与东盟10国的错综关系,将左右亚洲一体化的格局。

注释:

①美卡尔·多伊奇:《国际关系分析》,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第267页。

②法法布里斯·拉哈:《欧洲一体化史(1945-2004)》,周弘、彭殊祯、陈志瑞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12页。

③姜文学:《国际经济一体化的新特征与大国战略》,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页。

④《捷克总统克劳斯: 博弈欧洲一体化》,新浪网2010年11月15日, <http://finance.sina.com.cn/stock/t/20101115/00238950271.shtml>

⑤宋新宁,陈岳:《国际政治经济学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92页。

⑥John McCormic, Understanding the European Union, London: Macmillan Press, 1999, P.7.

⑦郭定平:《东亚共同体建设》,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4页。

⑧吴志成:《欧洲一体化观照下的亚洲地区主义》,《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

⑨吴志成:《欧洲一体化观照下的亚洲地区主义》,《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

⑩王国栋:《欧洲一体化经验与东亚地区合作》,《知识与创新》2009年第3期。

⑪李靖宇,韩建新:《论中国对东亚大市场成长的主导效应》,《中国发展》2003年第4期。

⑫刘兴华:《地区认同与东亚地区主义》,《现代国际关系》2004年第5期。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福建 厦门 350001)

(责任编辑:曾墨)